

元明

卷五

陈世松 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SI CHUAN TONG SHI

主编

贾大泉  
陈世松

四川通史



本卷主编  
陈世松

撰稿

陈世松 李映发

元明

卷五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SI CHUAN TONG SHI

四川通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四川通史·卷五, 元明/陈世松主编.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0. 3

(四川通史/贾大泉, 陈世松主编)

ISBN 978-7-220-08058-6

I. ①四… II. ①陈… III. ①四川省—地方史—元代  
②四川省—地方史—明代 IV. ①K2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0185 号

SICHUAN TONGSHI

四川通史 (卷五 元明)

陈世松 主编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部分图片  
摄影作者

蒋咏宁 徐英  
敬人书籍设计  
杨潮  
叶勇  
祝健  
罗韵希 帅初阳 武韵  
黄晓帆 帅黎明 胡翠兰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2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f@mail.sc.cninfo.net](mailto:scrmcb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排  
印刷  
成品尺寸  
印张  
字数  
插页  
版次  
印次  
书号  
定 价

(028) 86259459 86259455  
(028) 862595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市森广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70mm×230mm  
33.75  
555千  
10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  
ISBN 978-7-220-08058-6  
860.00元 (全套共七卷)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624





四川省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2004 年重点课题  
重修《四川通史》编委会

名誉主任：

陶武先 王少雄 黄新初

顾 问：

杨析综 何郝炬 章玉钧 陈 文 殷建中 贾松青

主 任：

侯水平 郑晓幸 张邦凯

副 主 任：

孙成民 罗 鸣 贾大泉 陈世松 罗韵希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炎 王 素 王庭科 向宝云 孙成民 吴康零

张邦凯 李绍明 李敬洵 陈世松 林 向 罗 鸣

罗开玉 罗韵希 郑晓幸 侯水平 段 渝 胡昭曦

贾大泉 魏瀛涛 温贤美 解 伟 谭继和

主 编：

贾大泉 陈世松

副 主 编：

吴康零

卷一	先秦	段 渝	著
卷二	秦汉三国	罗开玉	著
卷三	两晋南北朝隋唐	李敬洵	著
卷四	五代两宋	贾大泉	主编
卷五	元明	陈世松	主编
卷六	清	吴康零	主编
卷七	民国	贾大泉	主编





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的宜宾李庄旋螺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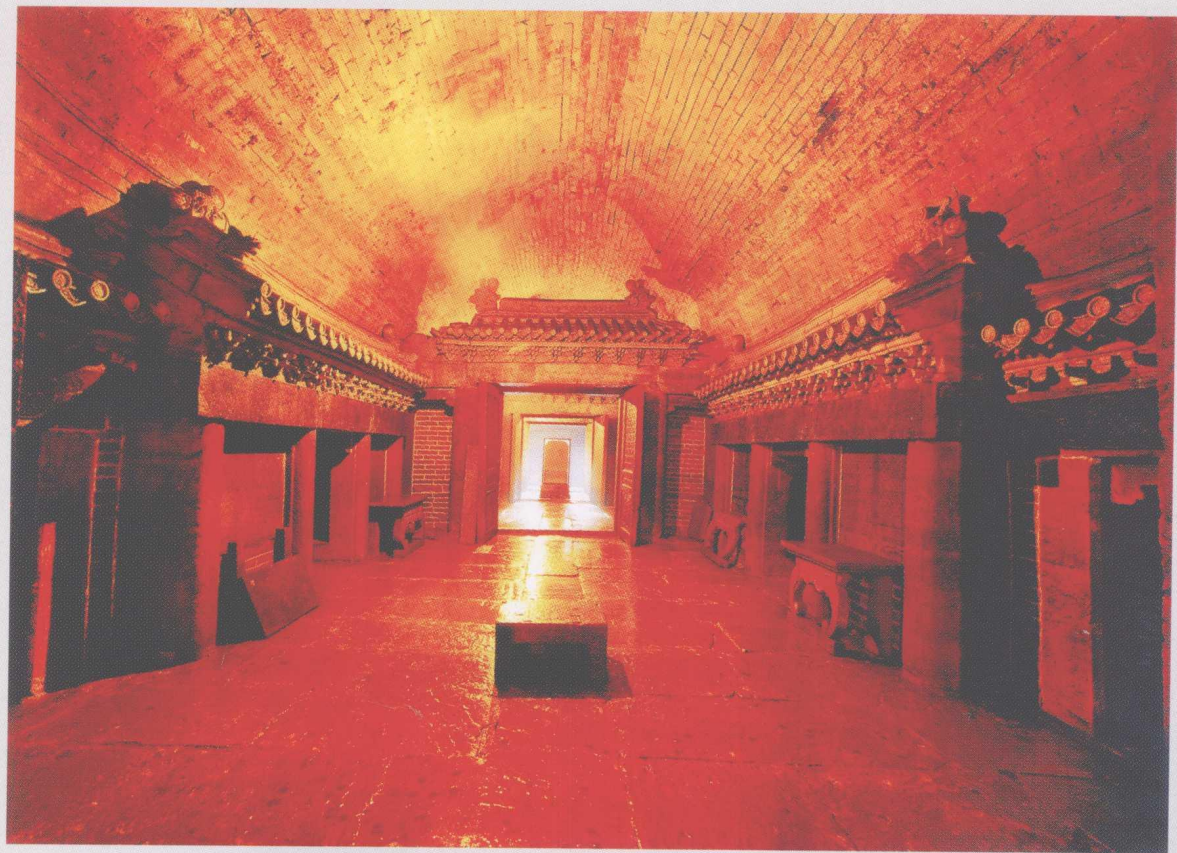


雅安名山永兴寺明代“五峰禅林”牌坊



始建于明崇禎十一年（1638）的戎州“百二河山”石坊（宜宾市水东门外）





成都十陵镇发现的明代蜀僖王陵地宫大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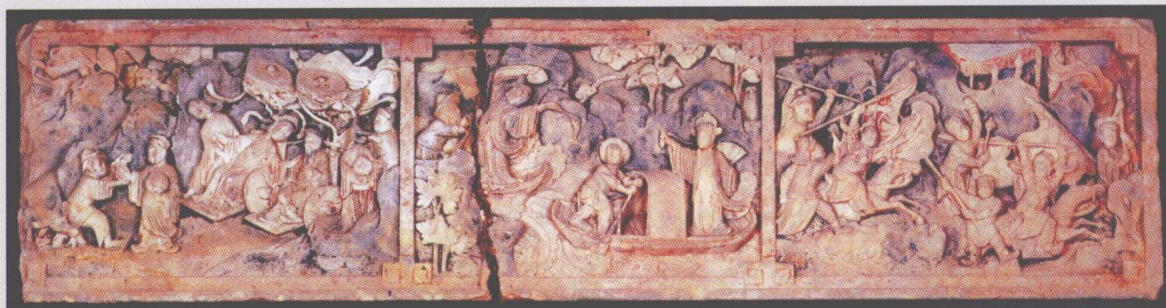


成都双楠小区发现的明代太监墓群





泸县明代龙脑桥石刻造像



泸县出土的明代戏剧石刻造像



成都温江出土的元代陶俑



重庆铜梁出土的明代陶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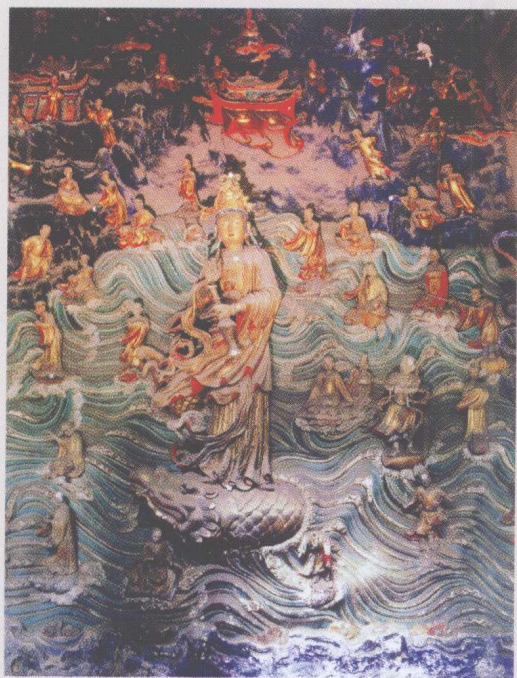




成都双楠小区明代太监墓出土的瓷器二件



蒲江县河沙寺大殿明代壁画



新津观音寺明代“飘海观音”塑像



云南丽江木王府明嘉靖十五年（1536）杨慎题匾





## 前 言

《四川通史》第五卷的时间断限，上起 13 世纪中期，下迄 17 世纪中期，其所论述的内容，包括元（1260~1368）、明（1368~1644）两代 400 年间四川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的基本情况与发展脉络。鉴于本书正文已按照章、节、目的统一体例将这些内容尽可能详细地囊括进去，前言再作重述就显得画蛇添足了。这里，仅提出元、明时代与四川历史进程有关的几个问题来加以探讨。其要旨在于，把本段历史放在整个历史长河和全国范围的时空构架中进行考察，以便将在历史背后起作用的、带规律性的因素揭示出来。这样做，有助于加深对本段历史的特点、地位的理解，从总体上把握元、明四川历史的发展变化脉络。因受篇幅局限，不可能提出更多的问题来讨论；表述方式也只能是宏观性扫描、史论式勾画。至于评述的视角、观点是否恰当，则是可以讨论的，期待读者批评指正。

### 一

发生在 13 世纪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战争，摧毁了四川社会内部的生机与活力，是对四川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头件大事。

元朝的历史一般以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登上蒙古汗位作为起点，





但蒙古进军四川的过程，则早在忽必烈的祖父成吉思汗时代就开始了。蒙古对于南宋王朝四川战区的军事进攻，经历了成吉思汗时期（1206~1227）、窝阔台汗时期（1229~1241）、贵由汗时期（1246~1248）与蒙哥汗时期（1251~1259），而至忽必烈汗时期。到忽必烈即位时，宋元双方在四川政治、军事势力的对比形势是：蒙古以川西、川北为据点，占领了全川三分之二的版图；南宋以川东为据点，其所能控制的州县大约只有60个左右。中统二年（1261）六月，镇守泸州的南宋守将刘整挈城降元。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采纳刘整建言，决定以长江中游的襄樊地区作为突破口，对南宋王朝开展战略进攻。此后，宋元战争的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至元十年（1273），元军突破襄樊防线，顺流直捣南宋腹心。南宋四川的防守范围只能收缩到重庆、合州等几个沿江孤立据点之上。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南宋临安王朝降元，四川仍继续坚持守土。至元十五年（1278），元军攻占重庆，宣布全川底定。直到次年（1279），合州守将王立降元，这才宣告围绕四川而进行了长达52年（1227~1279）的争夺战最后落下了帷幕。

与中国历史上别的改朝换代的战争相比较，宋元战争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者为实现建立全国政权目标而进行的战争。由于蒙古统治者在发动对宋战争的时代仍保留着落后野蛮的掠夺方式，也由于蒙古对四川的用兵早于南宋统治下的其他地区，而南宋四川又最后结束抵抗，因此，战争在该地区持续的时间长，其对四川地区的经济文化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后果是不言而喻的。固然，任何战争不可避免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只要这种破坏没有伤及根本，一般说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总可医治好战争的创伤，达到甚至超过原来的水平。然而，对于13世纪的四川地区说来，情况却是另外一个样。

大量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经历这场战争后，四川社会中那些能够体现上自汉唐五代下及两宋时代的经济繁荣面貌、生产技术程度和文化昌盛水平的种种成就，在元朝大多消失了。经历过这一历史巨变的宋、元时代的人，对此感受最深。如宋末文天祥撰文说：“蜀自秦以来，更千余年无大兵革，至于本朝，侈繁巨丽，遂甲于天下，不幸荡析。”<sup>①</sup>元人刘岳中也说：“宋南渡，蜀被兵最甚，

<sup>①</sup> 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9《衡州上元记》。





宋亡又甚。时丝枲织文之富，衣被天下，今不可复识矣，况衣冠礼乐之盛乎！”<sup>①</sup>

战争造成了四川人口的锐减，不仅严重损伤了四川社会中经济发展的元气与活力，而且，还把文化发展的这一内部机制给斩断了。经过宋元战争后，元初四川的人户总数仅12万户<sup>②</sup>。与南宋四川的统计数相比，四川人口下降幅度之大，远远超过了一般新旧王朝更迭时户籍略微偏低的正常许可值。在锐减的人口中，作为四川传统社会中文化发展支柱的世家大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祖籍四川仁寿的元代学者虞集，对于四川世家大族在战争中的惨重损伤作了许多回忆和记述。如说：“故宋衣冠之世家，百年以来几已尽矣。”他并指出：“吾蜀文学之盛，自先汉至于唐宋，备载简册，家传人诵，不可泯灭。宋南渡以来，蜀在斗绝一隅之地，然而文武忠孝之子，冠盖相望，礼乐文物之懿，德行学问之成，立功立言，卓犖亨畅，下至才艺器物之类，其见诸文辞者亦沛然，非它州之所能及。丧乱以还，废轶殆尽。”<sup>③</sup>又说：“昔者吾蜀文献之懿，故家大族之盛，自唐历五季至宋，大者著国史，次者州郡有载记，士大夫有文章可传，有见闻可征，所谓贵重。氏族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虽贵且富，非此族也，不通婚姻，盖犹九品中正遗风，谱牒之旧法，不独媚俗为然也。百十年来……其伤残转徙，千百无一二矣。”<sup>④</sup>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方文化的传播与延续，主要是靠文化人这个活的载体来实现的。曾经在铸造唐宋四川文化辉煌中充当中坚力量的世家大族，经历宋元战争，非死即伤，劫后余生，所剩无几。而幸存者及其后裔又大多寓居江南，不复再回故乡。这样的文化载体既然在元代荡然无存，也就很难期望四川文化能有延续和超越两宋盛况的奇迹发生了。

## 二

元、明王朝定都北京，改变了四川的外部生存条件，是对四川历史进程产

① 刘岳中：《中斋集》卷2《赠蒲学正序》。

② 《元史》卷12《世祖纪》。

③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3《亡弟嘉鱼大夫仲常墓志铭》。

④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0《题晋阳罗氏族谱图》。





生重大影响的又一件大事。

本段历史的时代背景，与此前的五代、两宋迥然不同的地方在于，一个南北统一的大一统局面已经形成。经由元朝缔造的大一统的局面，在明朝得以继续巩固、维持，由此也奠定了其后清朝中国的历史版图。从此，四川又成为继汉、唐王朝之后，由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管辖下的一个地方高级政区。

南宋的灭亡，全国的统一，标志着忽必烈汗变以草原为重心的大蒙古国为以汉地为重心的元王朝的完成。与以前建都和林、以漠北草原为重心的蒙古帝国不同，元朝则以中国本部为重心，并且不断将政治中心南移，及至最终以辽、金时代的中都——燕京为都城。为了适应正在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最高统治者的需要，忽必烈在向南宋发起战略进攻后不久，于至元九年（1272），正式下令改中都名为大都（今北京），并将中书省的署第建在大都。这样，大都燕京便正式成为元朝的首都了。

至正二十八年（1368），在群雄争霸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朱元璋，即帝位于应天（今南京），建国号大明，是为明太祖。明朝乘势北伐，攻克大都，灭亡元朝，但仍面临着残元势力和来自北方蒙古族的挑战。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统治，朱元璋不得不在北边驻扎重兵；但另一方面，又离不开政治中心应天，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定都于南京。明成祖朱棣即位后，经过削藩，为了适应新情况，他决定将都城由南京正式迁到自己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北京。这样，继元朝之后，北京又成为明朝的都城。从此，北京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的格局，历清代而至近现代一直没有发生变化。

众所周知，周、秦、汉、唐王朝统治全国的政治中心都在西部。开创周、秦、汉、唐王朝基业的政治势力，都是依靠西部地区而崛起的。为了固本强根，这些王朝的统治者无不把西部地区作为他们的“京畿”和“腹地”，不惜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维系和照顾。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包括四川在内的西部地区的经济、文化，因临近首都的地理优势，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和条件。于是，汉唐以降，无论是以关中平原为依托的西北地区，还是以成都平原为依托的西南地区，都曾经经历了一个向上发展的过程，在各个领域创造过无数的辉煌，为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但是，随后由于都城长安受西北民族的侵逼，中原统治者难以在西北地区安身立足，政治中心随时有向东迁南移的需要。从宋王朝的移治开封为都，到



再迁江南的临安为行在，从此，包括四川在内的西部许多地区开始逐步被边缘化了。及至元朝定都北京，将大都附近地区作为“腹里”，再经过明朝的迁都北京，从而使得四川远离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格局定型化。

如果说，从外部条件看，与四川为邻的西北民族、西藏和南诏等民族，过去曾经是威胁、牵制中原王朝的地区，如今均成为元王朝的疆土。元朝对边疆地区的有效治理，消弭了昔日的边患。元朝的大一统局面，从根本上阻止了10世纪以来四川历史地方化发展的势头，大大降低了中央王朝对四川的依赖。加之元、明王朝建都北京，使四川盆地远离政治中心。这样，从元、明以后，对于中央王朝而言，四川所赖以依存的地理优势，仅仅在于“蜀地三面邻夷”<sup>①</sup>，因此，当这些地区有警时，它还能在协助中央王朝治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上发挥“首领西南”作用。这样，四川也就难以像以前那样发挥影响全国局势，并获得独立发展经济文化的外部条件。在元、明时代，四川既然失去了继续维系其文化发达地位的外部条件，因此，它从两宋时期的鼎盛巅峰跌落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明人杨慎在一篇写给乡邦友人的书信中，就从地理与人文的视角，探讨了外部条件的变化对于四川文教兴衰的影响作用。他指出：“尝慨今天下士习，大不如古，盖道有升降，时则然。吾乡去宸极独远，文教之被，不及前代，地则然。汉都在长安，与蜀仅接壤，而相如、君平、王褒、子云，幽思揆藻，四海为嵩。唐则伯玉、太白，宋则苏氏父子，至元矣，而犹有虞伯生、邓文原，差强人意焉。国朝上轨汉唐，吾乡百七十年，士生其间，学犹未有定方，文犹未有定体也。”<sup>②</sup>显然，身为蜀人的杨慎，有感于“吾乡去宸极独远”，在文教之普及方面，在人才造化方面，均不及汉、唐、宋之世。他已经认识到，明朝四川之所以在“文教之被”上“不及前代”，究其原因，“地则然”，简言之，正是由于四川的外部地理区位条件变化决定的。只是因为生在当朝，他不便把其中的道理说透罢了。

① 天启六年（1626）四川巡抚陈睿谟语，见《明熹宗实录》卷79。

② 杨慎：《升庵诗文补遗》卷1《与周子籟书》，王文才、万光治主编《杨升庵丛书》（四），天地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 三

元、明时期连续出现的地方性割据政权，打压了经济文化正在增长的势头，是对四川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再一件大事。

元、明两代 400 多年间，在四川先后出现过两个地方性割据政权——由明玉珍在重庆所建立的大夏政权，以及由张献忠在成都所建立的大西政权。这样，在四川古代历史上，一共出现了 7 个建号自立的地方政权：东汉公孙述的“大成”、蜀汉刘备的“蜀汉”、西晋李特的“成汉”、五代王建的“前蜀”、孟知祥的“后蜀”、明玉珍的“大夏”和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尽管在这 7 个地方政权中，以大夏政权和大西政权存在的时间最短，前者为 11 年（1361~1371），后者两年多（1644~1647），但是，它们对于四川历史进程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却是难以估量的。

这两个地方政权之所以在四川产生，绝不是偶然的。它们都是在元、明王朝末世，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化，全国范围的农民战争已然爆发的背景下，利用当时封建王朝分崩离析、摇摇欲坠、朝不保夕、无暇西顾的“大好”形势，以及四川远离中枢、地理险阻、封闭自足的有利条件而称雄自立的。由于当时天下大乱，盆地内部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在群雄角逐、互相争夺、各自为政的局面下，新的政权面临着来自其他敌对力量的反对与围困。为了维系自己的生存，它们都不得不实行军事管制体制和保持战争状态。在这种背景下，四川很难维持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势必受到影响，难有任何重大作为。

四川盆地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一方面由于能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在地理上为群山险阻守卫，因而这一经济区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较强的封闭性；另一方面，四川盆地经济系统由于受群山环锁的制约和“地狭人夥”的限制，本身封闭程度较高，经济规模十分有限。所以，当大规模的动乱到来时，容易使整个社会卷入其中，并遭到破坏，从而导致正常有序的生产迅速下降，必然引起四

川盆地社会经济的急剧衰落，并造成下滑不可遏阻的趋势<sup>①</sup>。

正因为如此，所以，四川盆地经济区的承受能力是十分有限和脆弱的。当宋元战争于1279年结束，遭受重创的四川社会，经过有元一代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元气缓慢恢复，行将开步之际，元末农民起义的爆发，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出现了。大夏政权尽管宣布“安民保境”，但在此前后的战争创伤，亟待休养，采取军事管制，能够保证军队的给养已属不易，要想恢复战前的水平显然是不现实的。经过明朝灭夏之战的折腾，到了明朝，好不容易重新收拾山河，一切又得从头做起。就这样，恢复生产秩序，发展社会经济，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努力，到了杨升庵所处的正德、嘉靖时代，四川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开始有了某种转机，因而表现在经济领域开始有所起色，在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以新都杨升庵家族为代表的蜀学兴起的势头。但即使这样，也是与宋朝经济文化的黄金时代不能比拟的。正如杨慎所说：“吾蜀科第，莫盛于宋……经元兵之惨，民靡孑遗，积以百八十年，犹未能复如宋世之半也。”<sup>②</sup>

然而，就在四川经济文化的增长势头还不到宋代一半的紧要关头，四川社会又遭受了一次更大的浩劫——始自明末天启元年（1621）永宁（今叙永）土司奢崇明父子的叛乱。叛军先陷遵义，后据重庆，再攻川西，围困成都达百余日之久。叛军败溃后五年（1627），明末农民大起义便从陕西开始爆发了。从崇祯七年（1634）开始，明末农民军李自成、张献忠部，不断轮番向四川内地展开进攻，转战于川境内外，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所过州县，无不遭到兵火的摧残。直到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明朝覆亡。八月，张献忠再度入川，攻破成都。十一月，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此后，各种政治势力无不利用明清易代之际，在四川境土之上，各据一方，互相杀伐，直杀得巴蜀金瓯破碎，人民非死即逃，早就崩溃的整个四川社会经济，从此掉进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

反观四川以外东南地区，由于这些地区的地理区位、经济结构以及经济能量的承载能力与四川内陆盆地不同，故而有不同的发展轨迹。当社会动乱到来之际，这些地区不仅本身有较强的释放通道和承受能力，而且还在于，它没

<sup>①</sup> 参见谢元鲁：《秦汉到隋唐四川盆地经济区能量与信息交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sup>②</sup> 杨慎：《升庵遗集》卷22《内江科贡题名序》，王文才、万光治主编《杨升庵丛书》（三），天地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9~1070页。





有重复成为某个地方割据政权的支撑实体，没有连续多次遭受如此毁灭性的重创。这样，引起社会动荡的时间、范围、规模、程度都不如四川这样集中；即使遭受有如元朝灭宋这类事变的同样重挫，也能得到较快的恢复。因此，整个东南地区的经济能够在同一时期处于稳定的发展状态。一些过去在唐代与成都类似的城市如苏州、杭州，虽经元、明历史风雨的冲刷仍得以长期繁荣不衰。而四川则恰在此时，“屋漏又遭连夜雨”，在重重打击之下，经济的发展有如雪上加霜，连连受挫，文化的复兴机会一再丧失。这样，四川文化也便从唐宋时繁盛的巅峰跌落下来，其间虽然在某些领域不乏突出成就者，但整个水平已不可与昔日同语。

## 四

元、明时代大规模省际移民的兴起，注入了新的文化特色，是对四川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又一事件。

四川文化的发展变化，长期以来主要是受来自秦岭以外的中原文化的影响。从秦灭巴蜀开始，大批中原居民迁入四川，导致四川渐“染秦化”<sup>①</sup>。此后，历汉唐五代而及两宋，历代中原墨客骚人、商家大贾、避难流民源源不断，致使四川文化更多地反映出中原文化的特色。但是，自从宋元战争以后，及至元、明时代，四川文化的特色因大规模的省际人口流动带来了许多变化。

由于四川原有土著居民死亡流徙，几无子遗，这就为外省居民进入四川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南宋以来长江中游一带经济发展，以及江西、两湖之间的移民运动，则为长江中下游地区人民向四川启动移民创造了条件和可能。因此，从元朝后期开始，便有源源不断的湖广行省的居民迁徙入川的活动出现。至正十一年（1351），红巾起义爆发。徐寿辉领导的起义军转战江淮，又有一大批江淮百姓入蜀“避兵”、“避乱”。至正二十二年（1362），明玉珍率湖北籍红巾军将士入川，在重庆建立了大夏政权后，采取一系列保境安民的政策，吸引和安置了不少湖北难民。朱元璋立国后，于洪武初年派廖永忠入川，消灭了大夏政

<sup>①</sup> 常璩：《华阳国志》卷3《蜀志》。



权。随后又将一批来自江淮的明军将士留在四川从事戍守和屯垦。为了填补四川人口空虚，还采取强制措施安置了大批来自湖广的百姓，而另一大批江淮百姓也趁机迁居四川。

这样，从元代后期启动的江淮移民入川运动，带来了以湖北文化为代表的长江东南文化，并从根本上遏阻了自秦汉以来以秦陇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四川的影响。随着明清以来中国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东移南迁，秦陇文化本身的影响力也在减弱，经过长时期的文化交流、碰撞与吸纳，以湖北文化为代表的长江东南文化特色逐渐与四川本土文化融汇在一起，从而使得本土的巴蜀文化更多地表现出湖北文化的特色。由于湖北在文化地理上居于东西南北要冲的位置，不独能代表长江文化，并能沟通黄河文化，在文化特色上具有鲜明的交融性和沟通性<sup>①</sup>。这样的特色文化的注入，为明、清以后巴蜀文化的铸造、巴蜀人才的崛起带来了新的活力。

其中，以四川境内黄州府“麻城孝感乡”的移民群体的崛起最为突出。早在元、明时代就已进入四川的黄麻籍和“麻城孝感乡”的移民群体，不仅定居时间长，历史悠久，人数众多，势力强大，而且人才辈出，人文荟萃，颇多世家望族，社会知名度高，影响十分广泛。以至到了明、清时代，“以文章功业震耀当时”的四川文化精英，其先世大多来自于麻城。据光绪《麻城县志》记载，先世原籍为麻城，其功业足以“增光梓里”的四川文化名人中，地位最突出的有三位：一位是杨升庵，称其为“新都人，先世由麻城迁蜀”；第二位是来知德，称其“号瞿唐，精通易理。原籍由萧山徙楚麻城。元末祖泰由麻城迁蜀”；第三位是张鹏翻，称其“麻城人，入四川籍。康熙九年进士”。县志编者还评论说：“麻虽蕞尔一隅，其懋迁外徙者，多以文章功业震耀当时，洵足增光梓里。如上数公者，诚所谓自楚往也。即近代以科甲显……皆称祖籍麻城。访求宗谱，岂迁地而益能为良欤！”<sup>②</sup>

元、明时代省际移民兴起之后，不仅把以湖北文化为代表的东南特色文化注入巴蜀，同时还把湖北话（主要是“麻城话”）、湖南话、江西话等也带进了四川地区。据语言学者研究指出，从语言的实际情况看，今天的四川话与前人

① 周积明：《文化分区与湖北文化》，《江汉论坛》2004年第9期。

② 光绪《麻城县志》卷24《耆旧·流寓》。